

人工智能与人文专题

乌托邦叙事的延伸：“科幻网文” 对“命运共同体”想象的扩容

孙金琛

摘要：“科幻网文”既是网络文学语境中的“类科幻”创作，也是科幻文学对网络文化的主动适应。“科幻网文”的创作转化了科幻文学的想象经验，将科学描写、未来想象、乌托邦叙事回收至日常经验和新媒介语境之中，进而从两大方面拓展了传统的主流乌托邦叙事：一是对既往乌托邦叙事的弱化，二是对乌托邦文化精神的强调。“科幻网文”以文明的多样性取代了科幻文学的科学认识论，展现了对“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想象。“命运共同体”既是乌托邦想象的未来，也是未来乌托邦的文化表征，在这一点上，“科幻网文”体现出将乌托邦想象与文学叙事相结合的先锋姿态。

关键词：乌托邦；网络文学；科幻网文；科幻小说；命运共同体

“乌托邦”作为文学叙事的重要策略和隐喻仍然发挥着不可低估的潜能，尤其是在当下，网络文学中科幻题材的勃兴为我们再次讨论乌托邦叙事的潜能提供了机会。一般来说，科幻题材的书写往往隐含着对个人、集体、社会的乌托邦追求，或者说对不同“共同体”的情感表达与阅读认同。例如：在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中塑造的“未来大都会”，既有维新派对西方社会的文化认同，又有对中国社会未来的政治期盼；刘慈欣的《赡养人类》则通过塑造一个强制性平等社会来讽刺全球的贫富差距。因此，乌托邦叙事天然带有对当下经验的反思精神，这种精神往往通过探求一种更好的人性或社会图景来达成。

故而，不论是近代中国的科幻文学还是当下网络文学中的科幻题材作品，其主旨往往在于对人类生存的总体困境展开反思，并指向基于中国经验的“命运共同体”。“科幻网文”不仅拓宽了对“命运共同体”想象的边界，还在“时空共同体”的层面上扩展了虚拟化的生命经验，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经验与科幻元素进行了巧妙结合。正如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言：“正是这种新的想法，而不是诗意文本的新语言，震撼我们，将我们带入感知活动。”^①进

^① [美]罗伯特·斯科尔斯等著：《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王逢振等译，第33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而,“科幻网文”中的“命运共同体”想象预示了读者对情感价值的共同追求,即呼吁一种普遍的情感以重新组织个体的日常生活经验。

一、“科幻网文”对乌托邦叙事的延伸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在《艺术与文学的乌托邦功能》中暗示科幻小说作为一种“升级版”(upgrading)的乌托邦小说,重新激活了文学的乌托邦功能。^①换言之,作为乌托邦想象的文学叙事与科幻小说的融合构成了乌托邦在叙事层面的延伸,体现出乌托邦小说与科幻小说在未来想象上的亲缘关系。参照达科·苏恩文(Darko Suvin)的观察,二者在叙事学上均通过“全景式的大扫描”排斥个人主义式的现代文学模式,并将“未来社会”置为乌托邦叙事的策略,以此达到对现实社会的反思与批评。因此,苏恩文认为“乌托邦小说是科幻小说的一个亚文类。但同时,乌托邦小说又不仅如此——它也是科幻小说最正式和最重要的一位意识形态先祖”^②。作为“意识形态先祖”的乌托邦小说直接导源于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著作《乌托邦》,“乌托邦”(Utopia)又名“乌有之乡”,既指理想中的社会,又指不存在的地方。作为科幻小说亚文类的乌托邦小说,则专指乌托邦想象的书写类型,即在科幻小说叙事中展示出对未来社会的不同想象。继而,乌托邦小说从科幻小说的“意识形态先祖”到“亚文类”的转变意味着从“‘如何想象乌托邦’的命题转化为了‘乌托邦的想象如何被书写出来’的问题”^③,文学的乌托邦叙事在不同历史阶段延伸出不同的形式。例如在对“后发现代化”作者群体的考察中,有的学者就指出18—19世纪的科幻文学创作“无论是俄国还是日本、中国,科幻作家都希望将自己国家的落后状况推向极端,以这种极端化的景况警醒读者”^④。进入21世纪后,网络文学作为21世纪文学脉络的一支,其文学语境和表现形式又与中国近代科幻文学不同,“科幻网文”中的乌托邦叙事既有对近代科幻小说的继承,又有新媒介语境赋予的独特形式,其中对“命运共同体”的发掘与阐释成为乌托邦叙事在当代的延伸。

(一)乌托邦叙事的新媒介转化

“科幻网文”首先承接了中国近代科幻文学的乌托邦叙事经验,并将其与新媒介文化的表现方式结合了起来。如果要勾勒“中国科幻”的发展源头,首先是随着清末民初以来西方思想的传入,国人开始了对“科学小说”(science fiction)的译介与接受,自此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呈现出断裂与勃兴相互交替的特征。例如“十七年”文学期间中国科幻文学就以苏联科幻文学为学习的榜样,其时,阿·卡赞采夫的《太空神曲》、伊万·叶菲列莫夫的《仙女座星云》都对国内科幻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提出推动了科幻创作的本土化,涌现了如《古峡迷雾》《火星建设者》等作品;第二次高潮则受20世纪80年代“科技兴国”政策的影响,以欧美科幻文学的乌托邦表现为参照系,出现了乌托邦、反乌托邦、异托邦等主题的科幻小说创作,同时科幻文学的“文学性”价值被重新提及;“第三次转型”则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新生代”科幻作家代表刘慈欣、王晋康、何夕等登上世界科幻文学的舞台,中国科幻文学逐渐在世界科幻文化圈内产生影响。因此,有论者称中国近代以来的科幻小说发展总体上经历了三次转型。^⑤“科幻网文”则可以被理解为中国科幻文学与网络文学的交叉地带,也预示着中国科幻文学的第四次“转变”,这一转变与新媒介语境下人类的生存与文明的存续有密切关联。

“科幻网文”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科幻文学应对新媒介语境的内在动力及特殊表现方式,如布洛赫所说的“乌托邦功能的想象不是在空洞的可能性中徘徊、迷路,而是在心理上预先获

① Ernst Bloch, *The Utopian Function of Art and Literatur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German social though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8. pp.2-3.

② [美]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郝琳等译,第163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③ 王峰、陈丹:《科幻乌托邦:迈向乌托邦诗学》,第2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④ 吴岩:《科幻文学论纲》,第17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

⑤ 詹玲:《当代中国科幻小说转型研究》,第14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取某种现实的可能性”^①，“科幻”在中国的兴起具有直接的现实条件和现实欲求，“科幻”本身就是社会变革下特殊的文学表达形式，其内生于社会革命、技术革命、媒介革命的语境当中。中国早期科幻作品《新石头记》就借“文明境界”来反思西方文明对中国文化的入侵，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则借上海这一“未来大都会”的开放包容预言中国革命事业的前途，这种被“忧患意识”驱动的科幻写作也是中国近代文学的主基调。新中国成立后的科幻文学则与国家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要求保持同调，不仅关注国家、民族的未来议题，还深刻反思科技理性、人的情感、文明存续等危机议题，因此有论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科幻文学的乌托邦基调带有“忧患意识”与“幽暗意识”的协奏美感^②。例如刘慈欣笔下的“三体星”，每一次“三日凌空”都会引发大灾变湮灭文明；王晋康的《蚁生》借蚂蚁的生态社群关系隐喻人类社会乌托邦的前景，对压抑人性的劳动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进入21世纪后，科幻文学创作作为适应新媒介语境的变化开始与其他类型文学交叉，“科幻网文”由此产生。其中既有网络文学语境中的“类科幻”创作，也有科幻文学对网络文化的主动适应。“类科幻”创作大多为了满足商业化与消费文化的需求，因此多注重“烧脑”与“趣味”的结合，如《黎明之剑》《第一序列》中科幻只是作为“宏大背景”的布场，叙事的重心仍然是主人公的“奇幻”经历；另一类“科幻网文”展现出科幻创作对网络文化的适应，《我们生活在南京》（下称《南京》）、《大国院士》既延续了“硬科幻”的理路，又体现出“生活化”的审美趋势，其中的“时间胶囊”“碳基芯片”既与人类命运相关又是生活经验的传达。“科幻网文”的创作转化了科幻文学的想象经验，将科学描写、未来想象、乌托邦叙事回收至日常经验和新媒介语境之中，在“科幻寓言”中创造爽感、反转、代入感的阅读体验，这进一步导致了乌托邦叙事的延伸与转变。

（二）“科幻网文”中乌托邦叙事的延伸

“科幻网文”对乌托邦叙事的延伸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既往乌托邦叙事的弱化，“科幻网文”在制造“爽感”剧情时难免消解了

乌托邦的政治性，而对传统科幻世界观的“戏仿”则加强了不同文本间的“互文”阅读；二是对乌托邦文化精神的强调，基于媒介社会中读者身份的虚拟性与情感的可传达性，“科幻网文”的乌托邦叙事回应了读者对“情感共同体”的“神话”需求，并映射了“虚拟身份”在媒介空间中的情感归属。

首先，科幻文学的乌托邦叙事为“科幻网文”提供了故事框架和世界观设定，科幻文学的“未来世界”“生态灾变”“边缘社会”构建出与现实世界相区别的“时空共同体”，借以表达基于认识差异的审美体验。“科幻网文”则在这些基础之上融合新媒介语言风格、审美特性，生产出带有网络文学特色的“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等多重形态，逐渐延伸出“忧患意识”“幽暗意识”之外的第三种意识。《我绑架了时间线》（下称《时间线》）这部作品就淡化了恢弘的宇宙场景，也没有令人兴奋的高能机甲，主人公封棋通过不断穿梭在现实与未来之间达到自救与救世的目的，他每一次回到现实都代表着在“未来”中的一次死亡，而每一次进入“未来”都带有上一次失败的记忆。一般来说，这种对“时空旅行”（Time Travel）的无限制滥用会引起读者的不适，但由于《时间线》是一部基于“升级流”描写的“异托邦”“科幻网文”，读者所在乎的并不是科学认识的合理性，而是数值的平衡、异世界生物的多样化、主人公屡次失败后逆袭取胜带来的爽感。“爽”的阅读体验区别于传统科幻文学的“忧患意识”“幽暗意识”，但“科幻网文”须在“科学”“幻想”“爽感”之间做好平衡，若一味地追求爽感只会导致科幻世界观的崩塌。

其次，“科幻网文”所营造的“情感交互”又有超越“后人类”情感匮乏的一面，并丰富了科幻文学的人文关怀，通过对人物命运感、使命感的塑造，为读者带来“命运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体验，进而形成共同情感的审美追求。当刘慈

① [德]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一卷，梦海译，第16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② 王德威：《史统散，科幻兴——中国科幻小说的兴起、勃发与未来》，《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8期。

欣的作品在海外引发热议之际,“命运共同体”亦成为中国式科幻价值观念的标签^①而被介绍和认识。“命运共同体”本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后来演化为对“西方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及“后人类主义”的超越,在刘慈欣的作品中,“人类”作为“一”与“多”的辩证统一体,其外部是不同生命系统的冲突,内部则是地球文明的平衡。借由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后种系生成”(epiphylogenesis)概念,我们得以重新解读“科幻网文”对“命运共同体”的技术化处理,即在“科幻网文”中“人类”已经不再是原生的生命种群,义肢、智能AI、神经系统等“外植系统”改造了“人类”的面貌。此种世界观显然呼唤一种“后种系”的人文主义,区别于传统科幻文学对人类主体的坚守,“科幻网文”并不纠结于如何呈现“人”的统一性,而是更加注重不同生命情动的联通。

换言之,在“科幻网文”中,人物的命运和使命不再是打捞遗落的古典人文精神,而是积极构建属于数字技术世界的乌托邦边境。故而,斯蒂格勒一语道破这种“人的发明”,“生命的后生成层次并不随着生物的死亡而失去,相反,它自我保存和积淀,并遗留在余生和后代中……是一种包容了此在之未来的一切存在的数字”。^②在网络文学的交互空间中,读者身份的虚拟性决定了情感类型成为主要的“人文遗产”,其深层原因在于,“人”在媒介中的面孔并不是固定的。因此,基于虚拟身份建立的读者共同体需要自己的“神话”,以此可以在不同故事中实现文本的“互文性”与情感关系的“交互性”。例如《赛博英雄传》中向山与尤基的师徒关系、《故障乌托邦》中塔派与孙杰克的守护关系、《南京》中白杨与半夏的拯救关系,这些情感关系在阅读体验中营造的情感相似性来源于以读者社区为中心的情感分类。“科幻网文”的乌托邦叙事与读者社区中的共同体情感形成了指涉关系,存在于文本外部、媒介内部的读者社区占据了主导权,虚拟身份之间的情感交互塑造了“命运共同体”,并推动了“科幻网文”乌托邦叙事范式的转变。

由此,“科幻网文”中的乌托邦想象实际上是对传统科幻文学叙事形式的融合与整理,

其叙述过程既是对既有主题、世界观的复写,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乌托邦叙事的当代延伸。另一方面,“科幻网文”的独特魅力还在于其在诸多文本、命题和叙事形式之间搭建起了“互文性”的“乌托邦宇宙”。以《三体》的世界设定为基础,围绕“面壁计划”展开的“科幻网文”就有数十本,这些不同故事线的可能性及其内部形成的指涉关系构成了三体“乌托邦宇宙”。正如法国思想家朱莉娅·克利斯蒂娃(Julia Kristeva)所言:“一个文本总会同别的文本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联。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在它以前的文本的遗迹或记忆的基础上产生的,或是在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中形成的。”^③在互文性、同人创作及媒介社群交互的叙事演练中,“乌托邦”逐渐被媒介化为一种新的话语模式,其代表了对彼此情感的确认和相互感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读者在故事消费过程中的能动性,以及如何塑造出基于“乌托邦宇宙”的“命运共同体”情感,由此则可以进一步确认数字媒介社会中的主体边界和审美范式。

二、“科幻网文”中的“命运共同体”想象

新媒介语境赋予了“科幻网文”特殊的审美体验,同时形塑了“科幻网文”对“时空共同体”“人类共同体”的文化想象。这首先体现在网络文学的“类科幻”创作中人与非人的界限逐渐模糊,如《异常生物见闻录》(下称《见闻录》)中域外族群或非生命智能不再是纯粹的“他者”,当资源枯竭、星系湮灭成为共同的“命运”时,人与非人同样可以达成“共同体”的联合,进而通过高于世界主义的“宇宙主义”理想来观照人类的命运并打开新的未来时空。显然,“科幻网文”的共同体想象是科幻文学“认知间离”原则的文化转移,苏恩文指出“科幻小说

① Adrian Thieret, “Society and Utopia in Liu Cixin”, *China Perspectives*, Number1, 2015, pp. 33-39.

②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第15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③ 邱大平:《当代翻译理论与实践新探》,第202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

是一种认知间离(cognitive estrangement)的虚构性文学”^①,认为“间离”代表了科幻小说不同于“现实主义”文学的经验模仿方式,科幻小说的“间离”效果类似于科学的认识论态度,是对现实的一种探索和批判。故而,对现实的不同认知决定了科幻小说不同于其他文类的自律性,科幻小说对现实社会的探索与批评又与乌托邦想象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在以往的科幻文学中,受到科学认识论的约束,“非人”往往代表着“失常”和“灾难”,而“科幻网文”是站在“文明”的概念高度进行叙事的,人与非人只有文明的差异而不存在科学的真伪。进而,“科幻网文”以文明的多样性取代了科幻文学的科学认识论,展现了对“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想象。

(一)“科幻网文”中的时空共同体观念

“科幻网文”除了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文明观外,还展露出不一样的时空观念,其对“命运共同体”的时空想象根植于媒介空间的虚拟性,提示了虚拟时空中“命运共同体”的存在状态。在对“命运共同体”的想象中,“科幻网文”进一步打破“时空共同体”的科学观限制,展现了情感的虚拟交互性。一般来说,在传统的科幻文学作品中,即便可以进行“时空旅行”,也需要谨慎处理“时间悖论”^②的原则,但“科幻网文”通过梦世界、记忆世界、虚拟世界的任意性、交互性等特点,抹除了以往科幻文学严格遵守的铁律。在《时间线》《南京》两部作品中,记忆的回档与媒介信息的交互取代了“时空旅行”这一“硬核”技术,主人公虽然不曾“穿越”,但却可以高效掌握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各类信息。读者能够认同这种叙事方式就在于媒介社会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改造,“媒介在何种程度上能对时空关系产生影响,并非主要取决于其自身携带的内容或‘信息’,而是取决于其形式以及可再生产性”^③。试想我们身处家中阅读着世界各时各地的信息,并从中挑选心仪的美食和旅游胜地组合成一个美好的未来幻想时,这种搭载在媒介之上的乌托邦建构与《时间线》《南京》的拯救计划实质异曲同工。某种意义上,媒介社会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平等的情感自治潜能,但也面临着身份意识流散和“信息茧房”等危机。如同《南京》中的半夏,一个未来世界灾

变后的幸存者,虽然在世界末日的灾变中生存了下来,但实际上,毁灭后的世界恰恰是一个内置于媒介空间的“信息茧房”,半夏对人世的所有情感只得通过媒介来传递,媒介也成为她与文明世界沟通甚至延续生命的唯一渠道。

“科幻网文”所展露出的时空观代表着“后乌托邦诗学”的文学潜能,按照巴赫金(Bakhtin Michael)的说法,“时空体在文学中有着重大的体裁意义。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体裁和体裁类别恰是由时空体决定的;而且在文学中,时空体里的主导因素是时间”^④。“时空体”决定着文本的体裁类别,这也是“科幻网文”与科幻文学的不同之处,“科幻网文”的主要体裁是超长篇小说,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篇幅长度决定了其叙事时空体以嵌套叙事为主,形成了类型化的叙事风格。例如《时间线》就借助了升级文的叙事手法,《见闻录》则参照了西方科幻的神话体系。类型化的便利之处在于成熟的叙事模式,随着主人公对世界展开探索,故事世界的数据、地图、体系不断更新,使得“科幻网文”看起来具备稳定的时空框架,但随着“套路化”程度的增高,读者也更容易产生审美疲劳。故事的类型化和自我重复可以视作乌托邦想象的进一步枯萎,也代表了乌托邦想象与文本叙事的再融合。这种再融合首先建立在科幻文学的基础上,科幻文学将传统的政治经济乌托邦转化为一种附属性的形式,并将人类的未来视为宇宙文明的理想。而“科幻网文”的乌托邦想象则进一步将“未来”置于虚拟之中,正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认为的,“未来”并不建立

① [美]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郝琳等译,第34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② 时间悖论最早是在科幻小说中提到的。这个悖论的必要前提是: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三维空间之后的“第四维”——时间(注意:真实的第四维并不代表时间),能够穿梭到过去或将来,但由此引发了“祖父悖论”“先知悖论”“命题悖论”“自杀悖论”等诸多悖论,统称为时间悖论。

③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第2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④ [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钱中文译,第27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在空间和时间的精确绘制之上,而是通过暗示和比喻去接近,^①“命运共同体”既是乌托邦想象的未来,也是未来乌托邦的文化表征,在这一点上,“科幻网文”展现出了将乌托邦想象与文学叙事相结合的先锋姿态。

(二)“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能量

乌托邦想象从叙事层面到文化层面的延伸暗示了人类文明的共同诉求,按照鲍曼的说法就是“要实现更高层次的和更加包容的政治整合,时刻需要重新商定‘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区分,重新划定整合边界、区分边界以及把二者密切联系起来”^②,而这个“他们”不再是特定的人群、种族和国家,而是人类自身的未来,或者说是“准人类”。“乌托邦小说是一种文学类型或语言文字建构,其充分必要条件是一个特定的准人类的社群的在场……这一建构的基础是间离,间离源自一种拟换性的历史假设。”^③只有“准人类”才能构成“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并将乌托邦想象的政治能量转化为人类文明建设的文化能量。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命运共同体”展开理论建构的过程中,中西方发展出了不同的文化路径:在国内的理论语境中,“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常常一起使用,其理论源于2013年“习近平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的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以“人类”为主体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理念,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泛指“自由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个人形成的联合体”^④,而人的自由又被一切社会关系所决定着;在西方理论语境中,米歇尔·马费索利(Michel Maffesoli)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主要论述者,认为“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在理性的和/或政治计划的框架内找到表达,有时却相反,会采用集体感受性(sensibilité collective)这种更加模糊和难以界定的路径表达自身”,^⑤马费索利强调“命运共同体”既是政治性的追求又是文化理念的呈现。

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命运共同体”概念,都强调政治性的表达和作为“人类种系”的集体感受。在这层基本的理论共识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均强调对“理性文化”的建构作用,有的学

者指出“世界文学”作为理性文化的代表,既可以在理性层面上寻得共同性,也可以在感受层面上共筑共同体。^⑥自歌德、马克思以来,人类一直尝试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实践,指向理性、文化与文学的共通。如今,随着乌托邦想象由政治理想转为文化理念,“科幻网文”对“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想象进一步展现出了“后乌托邦诗学”的文化能量。“后乌托邦诗学”认为“从政治乌托邦到科幻乌托邦,现实政治能量不断衰减,文化能量却不断得到增强”。^⑦这种表现可以从“科幻网文”的时空描写中看出,在以往的科幻文学中,“世外桃源”、“飞地”或“星际边陲”成为政治理想的试验田,但“科幻网文”不仅将“未来世界”“生态灾变”“边缘社会”杂糅在一起,还对传统科幻的主题、世界观进行戏仿式的再创造,单就《故障乌托邦》中所涉及的空间描写来说,就融合了《异次元杀阵》《赛博朋克2077》《赛博格与太空》等作品对空间的想象,这种戏仿的游戏心态否定了乌托邦的政治性而高扬了文化的融通性。如果说布洛赫的“希望原理”是对古典乌托邦概念的否定,那么“后乌托邦诗学”则是对希望原理的再否定,“它指向一种‘不可能性’:把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匮乏补偿作为疯狂发生的情景来想象”^⑧。如《时

- ① Lars Schmeink, *Biopunk Dystopias: Genetic Engineering, Society and Science Fiction*,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6, p.67.
- ② [英]齐格蒙特·鲍曼:《怀旧的乌托邦》,姚伟等译,第22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 ③ [美]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郝琳等译,第155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 ④ 贺来:《马克思主义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研究》2016年第8期。
- ⑤ [法]米歇尔·马费索利:《部落时代:个体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衰落》,许轶冰译,第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 ⑥ 金惠敏:《重构文学和文化的普遍性》,《理论月刊》2023年第4期。
- ⑦ 王峰:《走向后乌托邦诗学——科幻叙事对政治乌托邦的解放》,第105页,《外国美学》第33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20。
- ⑧ 周志强:《“处在痛苦中的享乐”——网络文学中作为“圣状”的爽感》,《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间线》中反复进行的“时空旅行”，《见闻录》中屡屡湮灭的文明种族，《三体》的同人文学作品对原作故事情节的无节制重复，这些只需要经历一次便令人崩溃的场景在“科幻网文”中反复出现，最终导致“科幻网文”中的乌托邦想象走向了虚拟的“文化共同体”。

三、从乌托邦想象到“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理想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将乌托邦的文学叙事视为某种思想实验，认为其价值在于“以实验的态度肯定我们自己的世界里明显否定的事物，肯定对反乌托邦如果更仔细地观察其实就是乌托邦，同时要把我们现时经验中的具体特征分离出来，把它们看作是一种不同制度的构成因素”^①。即便是在乌托邦想象逐渐衰弱的当下，詹姆逊仍十分重视科幻文学的乌托邦功能，将那些对乌托邦想象的批评视为社会欲望的“反常性表现”，并构建起“政治哲学—社会理论—文学实验”的乌托邦诗学路径。实际上，乌托邦想象的出现与社会的发展危机密不可分，例如莫尔在《乌托邦》中所批评的正是陷入早期资本主义困境中的英国社会，布洛赫的《希望的原理》则直面乌托邦想象式微背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困境，雄辩地指出乌托邦“作为有意识的阐明行为，被知晓的解释，希望的行为内容(Akt-Inhalt)乃是肯定的乌托邦功能；希望的历史内容(Geschichts-Inhalt)首先体现在想象之中，并在现实判断中百科全书式地得到研究，而这一历史内容把人的文化与自身具体的乌托邦的视域联系起来”^②。乌托邦的历史就是人类文明的“希望史”，而乌托邦想象在任何时期都具备辩证性的两面：一面是通过“行为内容”对乌托邦想象进行延伸，由科幻文学到“科幻网文”的乌托邦叙事即是这一过程的具体展现；另一面则是在“历史内容”中对乌托邦想象展开“怀旧”，鲍曼将这一表征称为“逆托邦”，“逆托邦鼓吹秩序具有地方性、非终极性，并抛弃了‘达致完美’的思想，也抛弃了无休止地不断变革的观念，并先验地使不断变革去合法化，排除其可能性(和合意性)”^③。“逆托邦”揭露了工作

日益繁重无聊、生活琐碎毫无生趣的现实，并希望通过更高层次的包容拓展“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王国。

(一) 乌托邦的多重话语与政治潜能

乌托邦想象最初以政治经济学的叙事方式出现，如托马斯·康帕内拉(Tommas Campanella)在《太阳城》中对未来社会制度的细致描绘：“一切公职、艺术工作、劳动和工作，却是分配给大家来承担的，而且每人每天只做不超过四小时的工作；其余的时间都用来愉快地研究各种科学……而且大家都乐意从事这一切活动。”^④但即便是再完备的政治经济学叙事仍然蕴含着对未来的想象能量，这种想象在欧洲启蒙运动中转为对“人的解放”，在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看来，乌托邦社会之所以难以实现的原因在于人的意识本身，由于无法根除人的私欲，所以自由平等的公有社会迟迟不能实现。故而，傅立叶采取了一种灵魂宇宙论来消解私欲对公共社会的破坏，他将人的情欲分为三级：奢侈欲、合群欲、谢利叶欲^⑤，而最高级的“谢利叶欲”(统一欲)作为三级欲望的最终目标，预示了人的意识的满足，“幸福，作为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囊括一切情欲高潮的统一欲高潮”^⑥。乌托邦想象作为一种愿望而非政治计划被保留了下来，不论是科幻文学还是“科幻网文”，作为乌托邦想象的文本“容器”，也是乌托邦话语的“试验田”，均通过文本展现出了可能性王国的实现，并对乌托邦话语展开了多重塑造。

① [美]罗伯特·斯科尔斯等著：《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王逢振等译，第102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② [德]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一卷，梦海译，第16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③ [英]齐格蒙特·鲍曼：《怀旧的乌托邦》，姚伟译，第1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④ [意]康帕内拉：《太阳城》，陈大维等译，第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⑤ 法语“series”意为“组”，指的是多种情欲的组合欲望，不同情欲的相互协调使人达到愉悦的意识状态。参见[法]傅立叶：《傅立叶选集》第一卷，赵俊欣等译，第7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⑥ [法]傅立叶：《傅立叶选集》第一卷，赵俊欣等译，第7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乌托邦话语的多重性映射出可能性王国的内部肌理,同时,话语的多重性又是直接面向现实的。从19世纪工业社会的确立到20世纪全球金融体系的形成,随着自然生态愈加恶劣、人的“工具化”程度愈加根深蒂固,如何革命性地突破全球资本化的牢笼成为科幻文学的主题之一,乌托邦叙事逐渐蜕变为“恶托邦”式的反思。其中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毋庸置疑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而詹姆斯·巴拉德(James Graham Ballard)的作品则预示了科幻文学的反乌托邦追求,在《沉没的世界》中,巴拉德通过展示一个被科技进步所破坏的地球来批判现代社会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不言而喻,巴拉德的“地海世界”、布莱恩·奥尔迪斯(Brian W. Aldiss)的“温室”均表达了一种对现实发展预期的否认,其中既隐含了对乌托邦想象的挫败感,又带有对未来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忧虑。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描绘未来世界的科幻文本,如果做一个大致的区分,可以将其分为正面的乌托邦即积极的乌托邦,或者负面的恶托邦即消极的乌托邦,不同的乌托邦会产生不同的叙事能量”^①,乌托邦叙事本身是对政治经济乌托邦的一次文学性转化,将乌托邦想象的政治潜能转化为乌托邦叙事的书写方案,其中乌托邦、“恶托邦”、“逆托邦”及“命运共同体”共同编制了乌托邦的内部图景,并成为未来文化想象的测验机制。

(二)“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理想

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塑造了一种有别于乌托邦想象的叙事话语:乌托邦叙事并不汲汲于塑造一种完美无缺的社会蓝图,而是通过阐释乌托邦在当下社会中的必要性,使得科幻文学中的乌托邦潜能得以最大程度表现出来。布洛赫在“抽象的乌托邦”(Abstrakte Utopie)与“具体的乌托邦”(Konkrete Utopie)的比较中,标明了乌托邦作为一种“希望”应当被具体地叙述,也就是说,科幻文学的想象始终与现实相关,无论是其想象的内容还是形式,实则都暗含着乌托邦与社会文化的复杂深层关联。詹姆斯受布洛赫启发进一步阐释了乌托邦叙事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如何书写乌托邦”这一主题展开形式和结构上的文学“考古”,他揭示并

阐释出了当下科幻小说中潜在的乌托邦冲动,这一冲动的典型体现即是科幻小说对“未来”这一充满持久魅力的主题的不断书写,而这一书写的实质正是对乌托邦的文化生产。在对赛博朋克(Cyberpunk)小说的分析中,詹姆斯将其视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最高文学表达形式”^②,也即其在形式上充分展示出了跨国资本的未来景观,尤其是其描绘出的那些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全球公司体系,以及形形色色的义肢系统对“灵与肉”的侵占与阉割,更是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神经漫游者》中的全球智能神经网络,以及《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对生命真实的追问,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文本体现。就此而言,“科幻网文”对乌托邦叙事的延伸具备了对读的意义,因为在“科幻网文”中,赛博朋克不仅意味着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还是通向“命运共同体”文明的起始点。《赛博英雄传》《赛博剑仙铁雨》《故障乌托邦》的共通之处在于褪去了赛博朋克的小众与叛逆,并将其视为需要反思的大众文化经验,由此,超越赛博朋克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理想。

“科幻网文”对赛博朋克社会的叙事形式成为读者想象未来的重要中介,其对“未来”的描绘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当下性”的书写,“科幻网文”将“未来”放置进当下进行思考的这种做法决定了其乌托邦叙事的辩证性。如詹姆斯曾指出的,“一条是希望实现乌托邦计划,另一条则是在不同的表现形态和实践中找出略显隐晦但却无所不在的乌托邦冲动”^③。乌托邦冲动作为一种持续的文化能量奠定了“命运共同体”的未来理想,但这种理想又是根源于现实经验的,因而,任何乌托邦叙事作为乌托邦愿望和乌托邦冲动的“一种不知情甚至是不情愿的中介载体,它指向一种未知的东西,并发现自己

① 王峰、陈丹:《科幻乌托邦:迈向乌托邦诗学》,第3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②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419.

③ [美]弗里德里克·詹姆斯:《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吴静译,第1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无可救药地陷入过于熟悉的东西的泥潭,从而出人意料地变成了对于我们自己的绝对极限的思考”^①。换言之,以“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文化理想,一方面需要对未来进行理性的反思和探寻,另一方面则需要从现实经验中看到当前社会的局限和矛盾,这构成了“科幻网文”内部的辩证性。“科幻网文”既是通过当下想象未来,也是通过未来观看当下,这种内置于文本的交互视域呈现出未来社会的不同形态与未来文明的不同命运,使得“科幻网文”成为当代的“乌托邦文学”。

结语

如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名言“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②,时至今日,随着媒介社会对固有“时空共同体”的影响逐渐清晰,网络文学作为内生于媒介革命中的艺术形式,一方面暴露了媒介社会的危机,即在信息技术分布所造成的时空流散中我们如何重新把握整体性的生活方式,乌托邦在“科幻网文”中的表现形式由此成为我们反思的契机;另一方面,“科幻网文”正是在对“危机”的反思中丰富和发展了“命运共同体”的叙事方式与审美治理路径,这不仅是一场思想实验,还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探寻之路。

“命运共同体”势必会为人类的乌托邦理

想提供更切合时代的理论观念,尤其是在当下,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预言的“乌托邦的变革是可能的,但它却只有在与当今社会彻底决裂的时候才会发生”^③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我们需要充分重视“科幻网文”对“命运共同体”的叙事扩容和审美转捩,并为塑造一种全新的总体生活框架做好准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网络文学的文化遗产与海外传播研究”(21&ZD265)、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科研创新支持计划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命题在网络科幻小说中的叙事形式研究”(2024—KY—03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金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媒介文化。

-
- ① [美]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吴静译,第380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 ②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第17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 ③ Herbert Marcuse, *Marxism, Revolution and Utopia: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ume 6*, Douglas Keller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44.

(上接第89页)异彩纷呈的“现代神话”书写,赋予了中国网络科幻小说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出中国当代科幻文学“亚文类”独有的诗学品格。同传统科幻文学想象力建构一样,中国网络科幻小说最有价值的地方,不在故事的新颖和艺术形式的革新,而是以一种不断拓展想象力边界的方式,将人类现实生活中所面对的各种精神困境和文化状况加以“推演式的叙事改造”,通过想象力建构层面上的科学精神与文学表达的融合,呈现出与当下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人文介入与理性思考。在现代科学技术

飞速发展的当下,这种科幻未来主义的美学追求,无疑为当代社会发展和新文学实践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启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媒介融合语境下中国网络科幻小说的阐释评价机制研究”(23XZW03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鲍远福,贵州民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传播学。